



博学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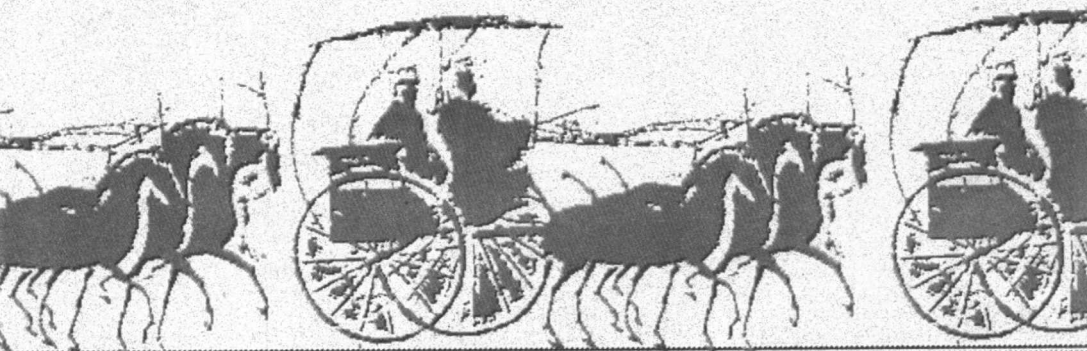
桃花

〔清〕孔尚任／著

贾炳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扇/(清)孔尚任;贾炳文,任爱玲评注.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5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戏曲小说卷)

ISBN 7-80598-666-5

I.桃... II.①孔... ②贾... ③任... III.传奇剧
(戏曲)—剧本—中国—清代 IV.I2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968号

桃花扇

著 者:[清]孔尚任

评注者:贾炳文 任爱玲

责任编辑:任如花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Fzxx@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gui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220千字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中国戏剧文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继元杂剧之后，传奇是明清时期戏剧的主要表现形式，《桃花扇》则是明清传奇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时势总是把伟大的人物及时地推向历史舞台。孔子的第 64 代孙孔尚任的出生与清王朝统一中国恰好是同一个时期，他是孔子后裔中最有成就的学问家之一，又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戏剧家。康熙皇帝励精图治、恩威并施，巩固了皇权，满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在广大汉族地区建立政权的第二个少数民族。公元 1684 年，康熙巡视江南，冬季返京，途经山东曲阜，孔尚任被推荐讲儒经，那年他 36 岁，正值年富力强。康熙帝大为赏识，给予褒奖，任他为国子监博士。这使孔尚任感激非常。

孔尚任并未亲身经历明亡的痛苦，1686 年他被派往维扬从事治河事宜期间，接触到了明朝遗民冒辟疆等人，明朝遗民自然发思古之幽情，南明王朝那许许多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融入剧作家的脑海中。1689 年返京后，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作，数易其稿，《桃花扇》终于在 1699 年问世了，时年为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 52 岁。当时，京城上演《桃花扇》真是盛况空前，甚至流传到边远地区。尽管孔尚任竭力回避正面描述清兵的武力征服，也用心良苦地用了曲笔，通过老赞礼之口，竭力歌颂清初的太平盛世，然而终因全剧歌颂抗清英雄，贬斥降清叛逆，清廷还是委婉地罢了他的官。

孔尚任写《桃花扇》的目的是让观众和读者知道：“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是为“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的。他要揭示短暂到只有一年有馀的南明王朝败亡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南明灭亡是由于清兵南下和南明自身腐败的内外综合因素造成的。南明皇帝昏庸荒淫，只知醉生梦



死，及时行乐；南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祸国殃民，一味贪恋钱色，卖官鬻爵，同时结党营私、报复清流（指东林、复社党人）。可见，昏君与奸臣组成的权力核心是不可能力挽狂澜、重振山河的。在南明内乱之时，左良玉气急身亡，在外患袭来之际，史可法只能独善其身、守义不辱、舍身尽忠而已。再说以陈定生、吴次尾等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人的主张，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的情况下，竟风花雪月，醉情歌舞。因此，康熙皇帝看了《桃花扇》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桃花扇》剧中的主人公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悲剧，因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及南明王朝内部忠奸斗争紧密结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艺术总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就使《桃花扇》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有机体，情节曲折、感情强烈、寓意幽深、余韵悠扬。在孔尚任看来，对“离合之情”只是“借”而已，而对“兴亡之感”才是“写”，“借”是从属的，“写”是主要的。可见，孔尚任的主观意愿是写历史，但不管他的初衷如何，《桃花扇》确实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桃花扇》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远地超过了作者本人的认识水平，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伟大的作品就是这样，它不只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辉煌，而且是永恒的辉煌。

伟大的精神并不一定是伟大人物的精神。

李香君出身地位低下，身世已不可考，从小被美丽善良的鸨儿李贞丽当做亲生女儿来抚养。复社领袖人物张天如、夏允彝等十分赞扬李香君色艺超群，苏昆生也是在复社文人声讨阮大铖后坚决离开阮家做了她的教曲师傅的。东林复社党人组成敢于和魏忠贤阉党势力斗争的清流文人团社，这样，它的社会影响也作用到了人来人往的秦淮妓院，自然也就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李香君，在她的心中形成了朴素的正义感。所以，当李香君得知“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阮大铖）之手”，又听了杨龙友为阮大铖说情的一番诡辩，而侯方域对阮大铖竟生侧隐之



心时，她义愤填膺地怒斥：“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官人……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她毅然决然拔簪脱衣唱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正是华夏几千年文明史一直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的真切体现。

本来侯方域梳拢李香君只是出于苦闷，为了排解忧愁而寻求作乐，双方只是在才华和容貌上的互相倾慕。通过“却奁”一事，李香君给侯方域上了一堂正气课，使他幡然悔悟。他说：“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因此，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便牢固地建立在共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上了，正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礼教的共同思想基础上一样。在这一点上也只有《红楼梦》与《桃花扇》交相辉映，其他的儿女风情戏，则要逊色得多。

李香君被卷入南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阮大铖在不得志时，想靠近复社文人，捞取政治资本。这点韬晦之计被李香君揭穿后，他气急败坏，伺机报复。崇祯帝煤山自尽后，他幸灾乐祸，“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拥立福王为帝阴谋得逞。“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阮大铖必然迫害复社人士，也必然对李香君下毒手。他怂恿马士英强迫李香君嫁魏阉余孽田仰时说：“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拢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当杨龙友为田仰撺掇此事时，李香君以死抗争，血溅诗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爱情的忠贞、对奸贼的抗争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场闹剧终由善解人意的李贞丽李代桃僵，杨龙友从中斡旋而蒙混了过去。《却奁》、《拒媒》、《骂筵》是塑造李香君性格的三场重头戏。南明弘光皇帝不顾国家安危，一味声色犬马、选优演戏。李香君冒名李贞丽被征入宫，马、阮在内廷审戏时，她故做不会演戏，马士英指责她“样样不会，怎称名妓”。当得以允许诉述心事时，她控诉道：“拆散



夫妻惊魂进，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她指责皇帝“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南明不过是重蹈历史覆辙而已。她怒斥马士英、阮大铖奸贼“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那是祸国殃民的奸党乱了朝纲，而“俺青楼皆知敬重”的东林复社却受到压制。李香君大义凛然、爱憎分明，她与时代脉搏同起伏，她与乱世风云共命运，她的个人遭遇是悲惨的，她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

与李香君受马、阮集团迫害相并行的另一条线索是侯方域被迫害。他奔逃到史可法处，协助史可法调解四镇内讧未果，又随高杰北上防河。高杰被防河将领许定国所杀，侯方域颠沛流离，又被马、阮以清除复社文人逆党为由而监押，侯的遭遇是南明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

南明弘光帝及马、阮之流逃亡后，侯、李等也分别被营救而逃出宫中。侯、李在苦苦的等待中互寻踪迹。苏昆生带着侯、李婚姻信物桃花扇在苦苦地寻找侯方域，他们在船上相遇后桃花扇到了侯方域手中，侯不禁情思绵绵、感慨万端。桃花扇象征侯、李曾经的爱情，象征他们劳燕分飞的痛苦思念。他们在道观奇遇后，李深切地对侯说：“想杀奴也！”猛然间，张薇道士一声断喝，割断他们的情根，双双入山修道。

侯、李的归道意味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不幸，他们无力挽救国家和民族的衰亡，也无力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或以死殉国、以死殉情，或入佛入道、苟活于世。《桃花扇》剧把这两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成为最后的选择：躯体健在，精神死亡。

这结局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相爱的人在颠沛流离之后好不容易相遇了，以常人的想像，他们应该团圆了；然而却又似乎是心甘情愿地分离了，这将意味着他们要忍受长期的痛苦的精神折磨。

以死殉情是中外最著名的悲剧主人公的结局：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精神死亡的也有先



例，贾宝玉皈依佛门，侯方域、李香君入了道家。两者是相似的，无论肉体死亡还是精神死亡，都体现了悲剧艺术的原则——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桃花扇》全剧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达了深沉的故国哀思和浓烈的亡国之痛，激发读者、观众怀念故国不做顺民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腐败亡国的沉痛历史教训，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以康熙戊子刻本为底本，以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因为是为普通读者提供的读本，故而未出校勘记。每一齣之后，有注释和短评。书末附有“孔尚任年谱简编”、“《桃花扇》研究主要文献”及“《桃花扇》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由于评注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大方之家斧正。

评注者
2005年4月



孔尚任与《桃花扇》(代序)

陈杏初

康熙二十三年(1684)仲冬的一天,山东曲阜城内人流不息,一片繁忙而肃穆的气象。因为康熙皇帝要亲临曲阜孔庙来致祭至圣先师孔子了。这对于孔府,可谓殊荣无比。

祭孔典礼在无比庄重的气氛中开始了。除了照例的跪拜之类的仪式以外,还有六佾舞,即由八人一列的六个队列合作舞蹈。这些乐舞生并非皇帝带来,而是孔府自己训练的。尽管御驾亲临,但他们却一点都没有怯场。在悠扬的乐器声中,他们配合默契,动作优美,使人不禁赞叹。仪式开始以来,乐舞生们在神色庄重的司乐官指挥下,“迎神乐奏昭平之章”、“奠帛、初献乐奏宣平之章”、“亚献乐奏秩平之章”等——举奏着,深得章法。在如此盛大的场合,能镇定自若、有条不紊,足见乐舞生们的平日训练有素和对音律的精通。人们不禁要问:训练这些乐舞生的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以《桃花扇》一剧蜚声文坛的孔尚任。

一 孔子的后裔

孔尚任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九月十七日。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山东曲阜人,自称云亭山人。作为《桃花扇》的作者,他在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孔尚任的出生,上距明王朝的覆灭和清王朝的建立只有四个年头。当时明王朝的宗室在西南地区建立政权(在历史上称为南明)仍在与清王朝抗衡,在清王朝统辖下的地区经常发生反清斗争,清王朝则用残酷的民族压迫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切使汉族的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怀念明朝的情绪。孔尚任



的家庭也是如此。

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他的父亲孔贞璠，字用璞，号琢如，明末崇祯六年（1631）举人，颇有才学。在《阙里文献考》卷九十三中的有关资料，说他“博学多才，崇尚气节，尝慕朱家、郭解之为。人。当明季兵荒荐至，解纷御侮，一邑赖之”。可见他是一位颇有节概的人物。入清后，他绝意仕宦，和明朝的遗老们多有交往。这样的家庭出身，自不能不给孔尚任的思想带来相当浓厚的影响。

在和孔贞璠交往密切的友人中，有一位贾应宠，字鳧西，号澹圃，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擅长作鼓词，自号木皮散客。他是曲阜一带的饱学名士。除了怀念明室外，经常对儒生嘻笑怒骂，用鼓词来发泄他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孔尚任十分喜爱他的这类作品。后来孔尚任曾听他讲《论语》，觉得他有很多见解不同于先儒，因而对他颇为敬佩。但他对孔尚任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为人和狂劲。孔尚任曾为他写过一篇《木皮散客传》，记录了不少有关他的言行。他曾公开宣称：“吾好利，能自生之，不夺窃；夺窃，盗也。吾好势，吾竟使之，不谬为谦恭，不仗人。谬为谦恭，媚也，仗人，犬也。”有一次孔尚任偶然到贾应宠家中去，这时年已六十的贾应宠把孔尚任让到上座，拿出鱼肉来招待孔尚任，并意味深长地对孔说：“吾自奉廉，不惜鱼肉啖汝者，为汝慧异凡儿。吾老矣，或有须汝处，非念汝故人子也。”并指着在一个墙角从事打扫的人说：“此亦故人子也，彼奴才，吾直奴之矣。”过了很多年以后，孔尚任仍清晰地记住了这件事。他在写作《桃花扇》时，其《听稗》一齣中有五段鼓词，就都是从贾应宠的《木皮散人鼓词》中抄录的。

除父辈的影响外，孔尚任的一位族兄也对他起了间接的影响。这就是孔尚则。

孔尚则字仪之，又字准之，号方训。崇祯十三年进士，被任命为河南洛阳县知县。洛阳系福王的藩地，而他却不愿意当福王的鹰犬，因而落职。后来做了南明弘光朝的官，因与当权的马士英、



阮大铖等不和，又被削职。孔尚任的岳父秦光仪，曾于明末在孔尚则家住过三年，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明末遗事，后来就一再说给孔尚任听。尤其是李香君（《桃花扇》的女主角）因为反抗强暴，以头撞地，面血溅污扇子，由杨龙女将扇中血迹画作桃花的事，从未见于其他记载，是孔尚则从杨龙友的书童处听到的。这个故事使孔尚任非常感动。

由于这些内心倾向于明朝政权的父兄、亲友的影响，再加上当时民族矛盾的尖锐、激烈，孔尚任在青年时期就想把明末的李香君及其与侯方域的爱情故事写成剧本，以此来反映明末的政治情况。而且，他把剧名也想好了——《桃花扇》。但可能是由于材料不足吧，他迟迟没有动笔。

二 石门山中

孔尚任渐渐长大了，和当时所有的儒生一样，他也受到了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在康熙八年以前他已经应童子试成了诸生。在这个时期，他除了学习传统的经书外，也开始注意乐律，并成为他以后长期研究的课题。

康熙初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明王朝的永历帝被杀，南明政权最后的象征消灭了。后来清朝统治者又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平定了动乱的局面，从而使政治统治趋于稳定。这期间，清朝统治者在加剧思想上专制统治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设博学鸿词科，收罗文人，开《明史》馆，便是这种怀柔政策的具体表现。而社会上文人的观念也渐渐地发生变化，孔尚任也是如此。康熙十七年秋天，孔尚任曾前往济南应乡试，但未能中举。回到曲阜就和二个族弟一起到城北的石门山游玩。那山洞壑幽碧、清泉佳木、景观奇幻，使他非常欣赏，遂萌生了要在石门山结庐的念头。也就从这一年起，他在石门山过了一段时期隐居生涯。

石门山自古便是一个名胜去处。杜甫曾经有诗吟咏其景色：



“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孔尚任在石门山建筑了一幢书堂，取名为孤云草堂。生活的清闲，使他结识了不少谈古道今的朋友。他在这里度过了四个春秋。这所孤云草堂便成了他与朋友作诗作词、研究经书的好场所。《律吕管见》一书也是在这里撰成的。但是他的仕进之心并未因隐居生活而泯没。康熙二十年，他用田产去捐了一个国子监生。正如他自己所说：“尽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生。”（《与颜修来》）

由于刻苦学习，他的学识在孔氏家族中逐渐有了声望。康熙二十一年的秋天，他应当时孔氏家族的代表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为他料理其妻子张夫人的丧事。孔毓圻字锺在，又字翊宸，号兰堂，博雅好古。他原对孔尚任颇有好感，通过料理丧事，对孔尚任的办事能力更有很深的印象，所以，第二年春他又聘请孔尚任参加纂修《孔子世家谱》及《阙里志》，并训练礼生、乐舞生，监造礼乐祭器。

说到修家谱，这在孔氏家族中是一件大事。孔家为了显示自己的子孙繁衍兴盛，要求对历代的祖宗有较详的记载。明天启以后，规定对宗谱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世家谱》一书，大部分是汉以后孔家的传记谱牒，是孔氏家族的历史。孔尚任在从事这个工作时，取材极严，对于《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也作了不少订正。《阙里志》则是记载有关历代追崇孔子之典、孔氏林庙古迹及旧事遗文的书。孔子的后裔屡有续辑。正像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十分重视修史一样，孔氏也总要选派族中最有学问的人来担任这些典籍的纂修，可见当时孔尚任在其家族中已有相当的地位。

三 康熙帝的赏识

康熙二十三年，也即公元1684年，这对于孔尚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秋天，他经过了一年多的辛苦，将《孔子世家谱》和《阙里志》修纂完毕，本想再回石门山，但因得知康熙帝即



将南巡，并将到曲阜来祭孔，孔毓圻等又把他留了下来，以便帮助进行祭祀的工作，如同孔尚任自己所说：“将还山，恭闻天子东巡，有事阙里，宗公族姓復留任襄祭事。任乃率诸弟子在庙肄习。”（孔尚任《出山异数记》）由于孔尚任精通音律，在训练乐舞生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而使他得以显示其出色的音乐天才及组织能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康熙的南巡是从这一年九月开始的。当时南方的三藩之乱（吴三桂等三个藩王的叛乱）已经平定，他为了利用孔夫子这块金字招牌来进一步缓和汉族人对清朝统治者的敌对情绪，便借南巡回京的机会，特意去曲阜“朝圣”，以皇帝的特殊身分来表示清廷的尊孔重儒。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康熙皇帝到了曲阜。孔尚任和诸生一起，在道边跪迎。当天皇帝住进了城南的行宫。傍晚，孔尚任被传到行宫。康熙帝在第二天要听孔尚任等讲经，这时他已看过孔尚任编写的、准备第二天讲经用的讲稿，对它相当满意。而这份讲稿是孔尚任深夜才动手写、天明就送呈皇帝审阅的。康熙命他在文字上略加改动，便顺利通过了。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康熙皇帝坐着轿子进了城，到孔庙举行祭祀。只见桌前祭品阵列，庙中鼓乐齐鸣，场面盛大，气氛肃穆。我们开头提到的1684年深秋的那一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祭祀毕，康熙皇帝步行到了诗礼堂。以孔毓圻为首的孔氏子孙向皇帝行礼。礼毕，由孔尚任升阶讲书。他讲的是《大学》首节，而讲经的结果，又一次显示了孔尚任的才华，同时也获得了很多官员的赞扬。康熙皇帝更为赏识：“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也。’”并指示随从大臣：“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出山异数记》）

讲经毕，孔尚任又和衍圣公孔毓圻及山东巡抚张鹏等人作为向导，一起侍从康熙游览孔子林庙。一路上，康熙曾几次问及孔尚任的年龄，这使孔尚任感恩不尽。他自己说：“书生遭际，自



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出山异数记》）在看完了碑林以后，当康熙问及附近有多少田地时，孔尚任回奏了当时孔府的情况，并趁势提出了扩充田地的要求。康熙皇帝或许本来就想借“尊孔重儒”来树立自己尊重汉族传统文化态度的形象，见孔尚任如此要求，便笑着对大臣讲：“此秀才好大胆！知朕敬重先师，尽力乞请。既到其家，皆依所奏可也。”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接着孔尚任又跟随着衍圣公孔毓圻一直送康熙到德州，才返回曲阜。

不久，皇帝破格任用了他，授为国子监博士。这固然跟他的才学有关，但恐怕还含有康熙想拉拢孔氏以进一步获取汉族士大夫好感的因素。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的事。

孔尚任由于康熙皇帝的抬举，从一个书生，平步升入京都的官场。他对此当然是感激的。他怀着一种济世的愿望来到北京，但很快感到了失望。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闲官，无事可做。在他当时所写的诗文中，便反映出这种苦闷。请看他的《出山异数记》的结尾几句话：“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他这一席话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和上述那种“犬马图报，期诸没齿”的兴奋感激心情，显然大不相同。如果不是他心里有苦闷，有隐忧，那是不会形成这样的矛盾的。这样的心境更增加了他的思乡之情：“故乡桑柘久凋零，寒食思乡两度经。”（《客邸寒食》）这正是他此时内心一个侧面的写照。

他在思想，在寻找出路。但出路何在呢？

四 淮扬治河

正当孔尚任苦闷彷徨之际，康熙帝决定疏浚黄河的海口，命工部侍郎孙在丰（字岷瞻，浙江德清人）前往该地督修。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孔尚任被任命为孙在丰的属员，到淮安、扬州一带（均属古代所谓“维扬”之地）去参加治河工作。他在赴任途中所作的



《渡黄河》诗中写道：

踟躇何计救桑麻，立马堤头唤渡槎。

八月荒浦飞白鸟，孤城落日照黄沙。

就这样饱览了途中的荒浦、飞鸟、落日、黄沙，他满怀着拯救生民的激情到了淮扬的河署。在那里，他看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景况：官吏的奢侈和民生的凋弊。有一次扬州的官僚请他饮酒看戏，场面的盛大使他不胜惊讶：

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椽，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钧天鼓乐何震骇，絮语热言须附耳。须臾礼成各举觞，一箸一匕听侑史。江瑶施乳曾耳闻，讶紫疑红试舌齿。酒味法传太尉厨，雪水书生愧欲死。一樽未尽两部齐，双声叠作异宫徵。座客总厌清商歌，院本斟酌点凤纸。曲曲盛事太平春，乌帽牙笏杂剑履。亦有侏儒嬉谐多，粉墨威仪博众喜。无情哭难笑不易，人欢亦欢乃绝技！（《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

在官筵上佳肴、鼓乐、歌舞、戏剧，极奢侈之能事。许多菜肴名酒，孔尚任都是第一次见到，使他为自己的没有见过世面而“愧欲死”。——当然，这只是讽刺性的反话。实际上，他对这种情况深感痛苦，但在表面上又不得不装出喜欢的样子，所以在篇末一语双关地说“人欢亦欢乃绝技”。为什么不愉快呢？因为他知道：在水灾的侵害下，“七邑耕桑户未收”（孔尚任《淮上有感》），扬州的许多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这哪里是官员们寻欢作乐、纵情奢华的时候？因此，他在《淮上有感》的结尾处讽刺地问道：“为问琼筵诸水部，金尊倒尽可消愁？”你们这些治水的官员呀，你们在豪华的筵席上喝完了美酒之后，是否已经忧愁消尽，满心欢乐了呢？他是希望还有几位官员能够不为这种“琼筵”所陶醉，仍然记得民间的疾苦。既然如此，他自己在这个盛大宴



会上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淮扬治河时期，孔尚任结识了不少知名文人和系念明室的遗民故老，从而对明末遗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他创作《桃花扇》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些人中有黄云（仙裳）、杜濬（于皇）、冒襄（辟疆）、宗元鼎（定九）、邓汉仪（孝威）、李沂（艾山）、许承钦（漱雪）以及画家龚贤（半千）等等。在和这些人的交往中，当然有不少仅仅是文人的诗酒之会，但也确有不少真诚的促膝交谈。比如杜于皇，他是一个崇尚气节的遗民，但与孔尚任却十分知己。他曾冒暑到孔尚任所坐的船中去拜访，置酒痛饮，直至日暮。孔尚任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先生岂尽嗜酒哉？实有一段倾吐不了之衷，特借杯酌以淹其时耳。仆与先生交最晚，而先生之交仆最真。”（《与杜于皇》）又比如黄云，当孔尚任感到孤寂、苦闷之时，他常常携酒食相慰。孔尚任在给他的信中曾谈到：“尘土马牛之人，得足下父子时相慰藉，义虽友朋，情则亲戚矣。”（《答黄仙裳》）还有一次他和黄云、邓汉仪等在许承钦寓所通宵畅谈明朝旧事：“所话朝皆换，其实我未生。”（《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所谈皆“不堪为门外人道”。此外，他在和冒襄、余怀等人的交往中，也获得了大量丰富的有关南明兴亡的遗闻史料以及南明文人遗事。

与此同时，孔尚任还利用治河的机会，遍游了江淮各地。后来还去了一次南京，到白云庵访问了原在明代锦衣卫任职的张瑶星（也是《桃花扇》中的人物），也游览了南京的燕子矶、扬州的梅花岭等地。江山胜迹、故老遗闻以及治河三年来的生活经历，沿途的所见所闻，不仅使孔尚任熟悉了后来写作《桃花扇》的素材，进一步体味到了遗民们对明朝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更加深了对南明王朝灭亡原因的理解。这样，他对于写作《桃花扇》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了起来。

孔尚任在早年决定创作《桃花扇》以来，尽管一直没有动笔，但却老在向好朋友夸耀：“我有一部剧作《桃花扇》，只是还不愿公开。”到了这时，他索性请一位在扬州认识的朋友徐旭旦给他



写了一篇《桃花扇题辞》(见徐旭旦《世经堂初集》卷十七)。《桃花扇》的最后一出《馀韵》中有一套《哀江南》，也是借用徐旭旦的《旧院有感》(《世经堂诗词钞》卷三十)，略加修改而成。

在河署中，孔尚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官场的派系之争。当时河署以河道总督靳辅为一派，孙在丰为另一派，意见不合。这在朝廷中也引起了争议。结果治河的工作只能暂时停顿。与孙在丰同往治河的诸人，被指责为“未尝留心河务，唯利是图”。朝廷决定“撤回差往各官”。孔尚任虽是孙在丰的属员，但还不属此类，所以被召到了扬州待命。

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孙在丰二人俱被革职，这一事件对孔尚任有相当大的冲击。和河署中的人一样，孔尚任深深地感到了宦海的变幻，对于个人的前途产生了渺茫之感。他在给内兄的信中写道：“下河一案，千变万化，虽智者不能测其端倪。弟沉浮于中，莫知抵止，盖宦海中之幻海也。”(《答秦孟岷》)十分形象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在河署的三年生活，名义上是在江淮治河，实际上无多少事可做，但又不能回京。在河署交际又广，俸不敷用，生活上贫困潦倒，有时连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幸得好友黄仙裳、俞锦泉时常接济，才免了冻饿之苦。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写出了自己的窘况：“目今坐客常满，食指日多，呼庚呼癸，未免捉襟，特向大仓假粒粟，亦为涸鲋丐涓滴于沧海。”(《与俞水文》)康熙二十七年除夕之夜，他写了二首《除夕夜感怀》，其一的中间两联道：

宦冷偏留湖冻处，家贫还累母残年。

人情薄厚今宵见，仕路逢迎几处全？

以上是他生活状况的写照，也是他心情的写照，他感到了冬天的寒冷，人生的凄寂！

三年的淮扬治河结束了。在这三年中孔尚任经历了生活的洗礼，在理想和实践、现实和历史的冲突中，他那“救桑麻”的豪情已随着滔滔的东流水消逝了，馀下的是“一半冷浮名”(《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